

【区域高质量发展】

以智能化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更高质量发展*

程 必 定

摘 要: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智能化因素极大地提升了长三角地区应对重大公共安全风险的防治能力,增强了一市三省在处理重大问题上的协同性。智能化助力新冠肺炎战“疫”的成效表明,智能化因素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四高”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是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径。长三角一体化作为国家战略,应是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须在正确认识理解区域一体化新内涵的基础上,把握对区域一体化的普遍要求和对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的特定要求,走智能化发展道路,以智能化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的更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一体化;智能化;更高质量;长三角

中图分类号:F0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0)05-0052-07 收稿日期:2020-07-13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安徽省深度融入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研究”(AHSKZD2018D005)。

作者简介:程必定,男,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安徽省时代战略研究院院长(合肥 230051)。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并对长三角一体化提出更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近两年来,长三角一市三省按照更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积极探索,已初见成效,但如何更好地推进更高质量的一体化,还需要继续在理论和实践上深入探索。长三角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应具有特定的要求,应走智能化推进更高质量发展一体化的道路。

一、长三角一体化更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依据

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纲要》,国内学术界、企业界和政府部门对如何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进行了热烈讨论,但人们对长三角一体化的讨论主要是围绕“高质量”发展,忽视了“更高质量”发展,而少了一个“更”字,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就大不一样。

长三角一体化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抓住“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这也是党中央所强调的。2019年5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

局审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纲要规划纲要》的会议就指出,长三角一体化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区发展,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首先,之所以要紧扣“一体化”这个关键,是因为在新时代,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协调发展是区域格局变化的主线,而国内外区域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一体化是各类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显然,一体化已是新时代中国各类区域发展的共同趋向。但是,因为中国不同地区间的区域差异很大,不同区域的一体化程度不同,而长三角一体化已走在全国前列,应该在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方面率先探索,提供先进经验,为其他区域一体化发展起到表率示范作用。其次,之所以要紧扣“高质量”这个关键,也是因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要由过去的高速度向高质量转换,各类区域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国内各区域发展的共同要求。但是,由于中国的区域差异很大,发展基础好、发展条件优的发达地区应对发展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对

全国高质量发展有更多的贡献,那就是更高质量的发展。以上两方面的分析表明,正因为“一体化”是中国各类区域发展的共同趋向,“高质量”是中国对各类区域发展的共同要求,长三角作为发达地区,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质量理应更高些。由此理解党中央强调长三角地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长三角一体化理应是更高质量的发展。

此外,对长三角一体化提出更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是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高度,对长三角地区提出的时代要求。党的十九大勾勒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是,到21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是,中国因国土辽阔,区域差异很大,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达地区既有条件做出更大的贡献,也有必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发达地区的发展虽然离不开其自身的不懈努力,但也离不开欠发达地区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支持和贡献。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通过体制因素决定的“剪刀差”,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提供了巨大帮助,而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因市场因素出现的“新剪刀差”,仍使欠发达地区以新形式、新渠道,继续向发达地区输送难以估量的价值。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刘志迎教授研究指出“新剪刀差”包括4个方面:一是由产品市场形成的价值剪刀差;二是由要素市场形成的价值剪刀差;三是在公共服务质量方面形成的剪刀差;四是在公共政策水平方面形成的剪刀差。在每一个“新剪刀差”的背后,欠发达地区都向发达地区输送了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新贡献。长三角地区就是这样的发达地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程中也同样获取过来自欠发达地区的贡献。所以,从强国战略高度看,长三角一体化提出更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从而带动长江经济带和其他地区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理所当然的。长三角地区应从国家战略高度认识和推进一体化的更高质量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体现长三角地区的责任担当。

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在内的一市三省,地域面积为35.14万平方千米,2019年的常住人口为22714万人,地区生产总值为23.72万亿元,分别占全国的3.66%、16.22%、23.7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分别占全国的21.6%、

35.8%。此外,长三角地区的科研力量雄厚,2018年长三角地区的R&D人员全时当量、R&D经费支出总额分别占全国的35.88%、31.97%,是中国经济技术发达地区,也是区域一体化发展最早的地区。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长三角地区就在全率先开展经济技术协作,区域一体化开始起步。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在长三角区域便成立了上海经济区,以区域合作为基础发展区域一体化,后来上海经济区虽然撤销了,但区域一体化仍在持续推进。1996年长三角地区成立了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区域一体化进入制度创新阶段。进入21世纪,区域一体化由部分城市向长三角全域扩展,长三角地区积极探索和构建一体化体制机制。由于经过长时期的发展积累,长三角一体化已走在全国前列,有条件、也有能力向更高质量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一市三省都以“更高质量”为标杆推进一体化,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正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长三角更高质量区域一体化的要义

区域一体化在中国已是很流行的概念,但学术界却有多种定义。西方学者最早是从国际贸易角度定义区域一体化的,如赫克歇尔给出的定义是:“各国经济之间的贸易融合到一个更大区域的过程”,显然,这是跨国的区域一体化。而中国作为地理大国、经济大国,区域一体化是国内的区域一体化,应从区域发展总体态势的高度对中国的区域一体化做出新的定义,赋予其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内涵。

关于中国区域发展总体态势的分析,中国学者也有多种概括,其中最准确而又简洁的概括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中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巨型大国,一方面,各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差别很大,另一方面,差别中也显示或潜藏着各种相对比较优势。不能因为自然资源禀赋的区域差别,而让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长期存在下去,推进各类区域发挥各自优势,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形成各具特色而又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逐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满足各类区域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这是中国区域发展的总体态势。从这个总体态势出发认识区域一体化,可以用一句话给出新的定

义,那就是:区域一体化是不同区域之间在资源禀赋差异基础上分工合作、共同发展的过程。

该定义赋予区域一体化3个新内涵:一是产业发展的差异化与协同化,体现区域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因为不同区域在自然资源禀赋差别基础上形成的产业是有差异的,这样的产业才具有相对优势,不同区域发挥各自特色,优势互补、分工合作,形成协同化的区域产业关联,区域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就会在产业发展中得以显现。二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社会福利的共同增长,体现发展成果的国民共享性。因为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提升人民福祉,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是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成果使全体人民共享。对区域而言,尽管自然资源禀赋有差别、产业发展有差异,但公共服务要趋向均等化,社会福利要共同增长。所以,中国的区域一体化必须着眼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社会福利的共同增长,体现发展成果的国民共享性。三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协调,人与自然和谐,体现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因为区域一体化必须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发展规律,中国的区域发展不仅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要把经济与社会发展协调、人与自然和谐作为区域一体化的新内涵,保证区域发展的长期可持续性。

以上3个新内涵是密切关联且不可或缺的,形成区域一体化的“三性”特征,这些特征在不同区域都具有普遍性。但是,“三性”特征又有质量高低之分,中国经济由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区域一体化也应转向高质量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高质量的一体化也是对中国各类区域的共同要求,甚至是基本要求,而对发达地区而言,对区域一体化应该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更高质量的区域一体化。所谓更高质量的区域一体化,应是“三性”特征处于最佳状态的区域一体化,包括过程最佳、结果最佳,并没有改变区域一体化的原有含义,但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机制、动力和效率都在发生深刻变革。区域一体化得到更高质量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较长时期的发展积累,只有那些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相对高的地区,才有条件迈向更高质量的一体化,长三角地区就是这样的区域。

以何种标准来判断长三角一体化达到更高质量的发展程度需要认真研究和科学把握。从国家的战略意图和长三角的实际出发,长三角更高质量

的一体化应在上述“三性”基础上,还应具有“四高”的新特征。第一,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即以上海为龙头,苏浙皖各扬其长,在资源禀赋差异和技术进步基础上,围绕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推进地区间产业更高水平的分工与协同发展,特别要推动产业与创新的深度融合,提升产品或服务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的自主可控能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经济发展的高质量,经济发展质量方面的主要指标在全国领先,一些重要指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经济发展的高质量是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核心。第二,空间结构的高优化。即提升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城市上海的全球城市功能和宁杭合的副中心功能,推进核心—副中心的功能分工、传递与衔接,加快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六大都市圈的同城化发展,构建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结构和融合发展的城乡结构,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深度发展,重塑长三角经济地理,高标准优化长三角地区的空间结构。空间结构的高优化是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地域依托。第三,市场机制的高效率。即打破行政区界限,完善一体化、现代化的交通网、信息网,构建要素流动畅通、网络完善的一体化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形成便利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市场环境,协同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合作共建与世界市场深度接轨的对外开放平台,培育更多的市场主体融入全球生产和服务市场网络,实现市场机制的高效率。市场机制的高效率是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条件。第四,区域政策的高集成。即以更高质量一体化为主题,进一步完善长三角区域合作机制和政策体系,在区域合作机制上推进事务性合作向制度性合作升级、政府间合作向社会性合作深展,在政策体系方面提高一市三省政府间政策制定的统一性、规则的一致性和执行的协同性,推进相关政策在“最大公约数”基础上的协调一致,实现区域合作政策的高集成,向长三角政策一体化方向迈进。区域政策的高集成是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保障。

综上所述,长三角更高质量区域一体化应该是“三性”“四高”的一体化。其中,“三性”是对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普遍要求,“四高”是对区域一体化更高质量发展的特定要求,“三性”“四高”都是对长三角地一体化的基本要求。具有“四高”特征的

区域一体化,才是发展机制、动力和效率在发生深刻变革后的更高质量区域一体化。长三角一市三省应在一体化已取得较好成效的基础上,围绕“三性”的普遍要求和“四高”的特定要求,积极探索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径。

三、以智能化开拓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径

进入21世纪后,蓬勃兴起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实质上是智能化革命,快速发展的各种智能技术正有效地推动着产业结构的提升和社会结构的变革,进而推进着产业和社会的智能化发展。在新时代,长三角地区应以智能化开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径。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智能化应该是生产力的概念,而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人类社会曾经经历了采集狩猎时代、农耕时代和工业化时代,以历史性更迭的技术浪潮为标志,形成了生产力发展的几次伟大浪潮。先后是采集狩猎时代的石器化浪潮,农耕时代的铁器化浪潮,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机械化浪潮,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电气化浪潮及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信息化浪潮,这些技术浪潮都为人类社会进步输入了巨大动力。在21世纪初涌现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人类掌握了更为复杂的智能技术,正在掀起波澜壮阔的智能化浪潮。可以说,智能化是人类社会在新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向,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智能化浪潮中,中国抓住了机遇,智能化技术水平快速提升,并在某些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智能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尤为突出,正在推进中国社会向智能时代迈进。而长三角地区是中国智能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根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发展研究所发布的《中国云制造指数(2019)》显示,2018年长三角地区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达到16669万个,占常住人口的73.9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8.4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企业上云指数达55.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5个百分点。企业是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受益者,长三角地区越来越多的企业注重利用大数据,在“云”中进行决策、生产、销售、经营和为客户服务,出

现了生产与服务精准化、客户关系稳定化、业务边界柔性化、经营业态多样化的新态势。智能化因素不仅会大幅度提升单个企业组织形式的敏捷程度,更会在整体上推进相关线性产业链向智能化生态群转变,在网络平台基础上打造集群化产业发展新格局,使关联企业在一体化的分工合作中分享发展红利,为区域一体化发展输入不竭动力,有效推进产业基础的高级化和产业链的现代化。如今,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很快,数据资源“入云”越来越多,企业和自然人的活动都可以利用“云”的智能化因素把距离缩短为零,有效配置资源与要素。显然,在企业的推动下,长三角一体化会形成更有活力的机制和动力,有更高的效率和质量。世界刚进入5G应用时代,中国5G应用发展早,长三角地区的5G应用在全国领先,为一体化的更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因此,长三角地区有条件有能力走智能化道路,推进一体化实现由高质量向更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升级,率先迈向智能化时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长三角地区的时代新贡献。

四、以智能化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四高”发展

长三角更高质量区域一体化是“三性”“四高”的一体化,而“四高”作为对更高质量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特定要求,就显得尤为重要。长三角地区应围绕这些特定要求,突出智能化,充分发挥智能化作为先进生产力因素的巨大作用,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四高”发展。

第一,智能化会有效推进长三角经济发展趋向更高质量。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高低取决于生产力的先进程度,而智能化作为当今社会最先进的生产力,如果将智能化因素广泛渗入长三角一体化的产业协同发展之中,会更有效地推进长三角经济的更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智能化的社会应用必须优先发展智能产业,而智能产业本身就是更高质量的产业。长三角地区智能产业发展早,许多智能产业的行业相应成立了一体化产业联盟,以龙头企业为骨干,正有序推进长三角智能产业的一体化协同发展。如沿横跨沪浙皖G60国道的大中城市智能产业布局密集,已成为G60创新走廊,企业在政府的引导下,成立了智能产业联盟,会在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基础上带动长三角经济的更高质量发展。另

一方面,智能化不是简单的“去工业化”,也不是重复的“再工业化”,而是对工业化的全面赋能,是在新基础上的“升工业化”。其突出表现是运用智能化因素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智能化因素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进而从产业基础层面推进地区经济的更高质量发展。在长三角地区,最为突出的是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一市三省的制造业普遍向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精品制造、绿色制造和服务性制造转型升级。即使在长三角省会城市中经济实力相对极弱的合肥,如今也已成为智能制造发展高地,并于2018年、2019年成功举办了两届世界制造业大会,安徽也由过去的农业大省发展为位居全国省区前十位的制造业大省。近年来,长三角地区还在积极合作研发、孕育和发展一批未来智能产业,这些产业会对长三角经济的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智能化支撑。

第二,智能化会有效推进长三角空间结构趋向高优化。区域空间结构的优化程度取决于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中心城市与边缘腹地之间空间距离的有效缩短,形成一体化、同城化的都市圈和多中心、网络化的城市群空间结构,而智能化的最大优势在于会更有效地缩短空间距离。一方面,智能化因素的引入会推进交通运输的高速化、便捷化、舒适化,以缩短行程上的时间距离,替代缩短自然空间上的地理距离,优化空间结构的效果非常显著。在长三角地区,一市三省积极推进重大交通设施一体化建设,正在形成广覆盖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城际高速、动车和航空运输体系,以缩短城市之间的行程时间距离,优化区域空间结构,使要素流动更为便捷,资源配置更有效率。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智能化会以数据化的“云”技术跨越自然地理障碍,大幅度降低产品和要素的流动难度,在更高层次上使空间结构更优,使经济活动更有效率。在长三角地区,已形成覆盖城乡的互联网,在“云”上消除距离,以新的方式优化空间结构。由此以来,地面上高速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云”层上泛在性的互联网密切配合、相得益彰,既以时间替代空间而缩短距离,又以“云”覆盖消除城乡距离,更高效地优化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中心城市与边缘腹地之间的空间结构,开辟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径。

第三,智能化会有效推进长三角市场机制趋向

高效率。区域市场机制的效率高低虽然取决于多种因素,但在中国,打破行政区的分割程度则是最重要的因素,而智能化的最大优势正在于以“万物互联”打破行政分割,有效推进长三角市场机制趋向高效率。打破行政分割并不是取消行政区界,而是注重穿透行政区界的方式与能力,使产品和要素流动更便捷、市场秩序更透明,企业的制度成本更低,而智能化就具备这样的能力。智能化使人机互动、万物互联成为现实,自然而然地打破行政区范围,迅速而高效地穿透行政区界,以极低成本优化资源配置,使经济活动全过程、各环节都体现机制的高效率。在长三角地区,互联网发展早,“万物互联”效率高,如浙江桐乡乌镇早在2014年11月就成功举办了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搭建了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的国际平台和国际互联网共享共建的中国平台,构筑起中国乃至世界“万物互联”的高地,乌镇也成为全球公认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5G商业化应用正在长三角地区普遍展开,会推进长三角形成要素流动畅通、网络完善的一体化市场。显然,智能化因素以先进技术力量使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得以释放,从而推进长三角地区市场机制趋向高效率。

第四,智能化会有效推进长三角地方政府的区域政策趋向高集成。中国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必要条件是地方政府开展区域合作,要求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在“最大公约数”基础上一致起来,这个“最大公约数”应该是“公平均等”,在“公平均等”基础上的区域合作可以共建共享,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区域合作的积极性,是促进一体化更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保障。一方面,从价值层面看,智能化的价值导向是普惠共享,为地方政府相关政策在“最大公约数”基础上一致起来奠定了思想基础,尽管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差距,但地方政府在普惠共享价值观的思想基础上,容易推行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政策,会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福利的公正。另一方面,从方法论层面看,在万物互联、人机互动的智慧时代,智能化技术快速向社会大众普及,越来越多的大众会掌握贡献信息、分享信息的方法,从而能在信息共享中实现机会的均等和发展成果的普惠,又会推进地方区域政策在公平均等基础上趋向高集成,开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新路径。在长三角地区,2018年7月编发的《长三角一体化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对交通、医疗、社保、科技等领域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和智能化技术的使用，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可行性的措施并得以顺利实施。2019年5月以来，沪苏浙皖都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纲要》，并推出了相应的实施计划，在注重政策协同的基础上，使一市三省地方区域政策的集成程度也得到了提升，智能化因素从“公平均等”层面对长三角区域政策高集成的推进力度不断增大。

以上分析表明，智能化因素会从不同层面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的“四高”发展，“四高”之间又彼此影响、相互促进，推进一体化发展由高质量趋向更高质量。显然，智能化是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径。在新时代，长三角地区应实施智能化战略，走智能化发展道路，以更高质量一体化的发展推进长三角地区向智能社会新时代迈进。

五、新形势下智能化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启示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长三角地区正在推进的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利影响，智能化因素在此次战“疫”和复工复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长三角地区推进一体化的“四高”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启示。

第一，人工智能助力战“疫”，催生了智能化因素在长三角的应用场景，有利于化解长三角一体化“四高”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重大公共安全风险。比如，2020年1月23日，全球首台“无接触式自助挂号机”出现在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医院的发热门诊；2020年2月初，合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研发的“全过程无接触测温安检一体机”率先在上海地铁使用；2020年3月3日，在合肥量产的“无接触浮空式电梯终端”开始发往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的个人“健康码”在长三角地区得到公认，准确把握了疫情动态，保证了劳动力跨地区的安全流动。此外，在线学习、居家办公、电子商务、“云”上经营等工作、生活方式在长三角地区快速普及，“不接触”经济已融入长三角地区人们的生活、工作之中，既阻隔了病毒传染，又助力复工复产，减缓了疫情对一体化发展的冲击。

第二，长三角地区广泛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开展数字战“疫”，有利于长三角地区开拓数字经济助推一体化“四高”发展的新路径，这主要体现在长三角地区探索数字战“疫”的成功实践方面。比如，一市三省围绕打赢新冠肺炎战“疫”，引导和鼓励平台企业、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等积极探索数据开发的新技术、新方法，重点在医疗卫生领域建立科学高效的数据开发机制，加快医疗卫生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为疫情监测、防控、医治和物资保障夯实数据基础，提高数据利用价值，增强风险识别与预警的科学性、准确性。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时正值2020年农历新年，复工组织困难、货物运输受阻、物资供需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突出，一市三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建立跨行业、跨地区的数据共享机制，开启了防疫应急物资信息对接“直通车”，对应急物资信息进行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实现了物资供需跨行业、跨地区的精准匹配，逐步完善了数据共享反馈机制，有效地降低了供需运行成本，提高了复工复产效率。

第三，长三角地区在运用智能技术战“疫”中促进了政府与企业的全面合作，有利于长三角地区在一体化“四高”发展中完善政企合作机制，这主要体现在长三角地区对智能化应用政企合作机制的积极探索方面。比如，一市三省在战“疫”和复工复产中注重政企合作，建立数据平台，积极探索数据平台的运行机制，在统一数据标准基础上，进行数据归集、数据交换、数据清洗和数据质量考核评估，政府侧重于运用数据分析完善决策机制，企业侧重于建设数字化产销体系，复工复产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最为突出的是，浙江省政府与阿里巴巴合作，帮助中小企业建设数字化产销体系，提升了中小企业的数字开发开放能力，使浙江成为全国中小企业复工率最高的省份。此外，一市三省政府和相关企业还加大了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合作搭建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领域的技术研发和数据应用场景，为智能化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四高”发展积累了经验，历练了队伍。

第四，疫情倒逼长三角地区加快运用智能化因素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长三角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和智能技术应用，展现出一体化“四高”发展的广阔前景。比如，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战“疫”需求为长三角地区健康卫生材料、防疫设备产

业和无人配送物流体系建设带来了机遇,许多企业运用大数据深化产业链重构体系,主动参与全球化产业分工,智能产业发展步伐加快。2020年一季度,长三角一市三省的经济下降幅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南京经济增幅上涨1.6%,是全国经济总量超万亿元的城市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城市,南京在全国城市排名中的位次跃升1位。又比如,在智能技术的应用方面,不少城市为科学战“疫”,加快推进信息技术在市政、能源、政务、交通、卫健等多领域的智慧化应用,进而带动智慧城市发展。最为突出的是,杭州率先在全国建立数据化“城市大脑”,其他大中城市也纷纷跟进,上海的“城市大脑”还升级到2.0版,延伸到街道社区和居民家庭,线上线下密织疫情防控“安全网”,把“一网统管”系统构建得更加完善,及时有效地阻隔了病毒传播,确保了复工复产效率。

综上所述,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智能化因素极大地提升了长三角地区应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防治能力,增强了一市三省在处理重大问题上的协同性。智能化助力新冠肺炎战“疫”的成效表明,智能化因素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四高”发展具有巨大潜力,是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径。新时期,长三角地区应坚定地走智能化道

路,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新华社记者.长三角主要负责同志召开2018年度座谈会[N].解放日报,2018-06-02.
- [2]中共中央、国务院.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N].人民日报,2019-12-01.
- [3]新华社记者.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N].人民日报,2019-05-14.
- [4]刘志迎.长三角一体化面临的“剪刀差”难题及对策[J].区域经济评论,2019(4).
- [5]F·Heckscher.Mercantilism[M].New York:Macmillan.1959.
- [6]习近平.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J].求是,2020(1).
- [7]程必定.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新论[J].学术界,2019(11).
- [8]李彦宏.智能革命[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
- [9]杨沛霆.科学技术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6.
- [10]张江健.智能化浪潮[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9.
- [11]程必定.以全面智能化推进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J].西部论坛,2020(1).
- [12]理查德·沃特森.智能化社会[M](中文版).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
- [13]汪永安.疫情之下,我们如何“智慧生活”[N].安徽日报,2020-04-23.

Promoting Higher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gration with Intelligence

Cheng Biding

Abstract: Having experienced the test of COVID-19 epidemic, intelligent factors have greatly improved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capability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to deal with major public security risks, and enhanced the coordination of one city and three provinces in dealing with major issues.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lligent support for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shows that intelligent factors have great potential to promote the “four high” development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which is a new path for higher 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s a national strategy, the integration of Yangtze River Delta should be of higher quality. In the new era, we must grasp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for higher quality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on the basis of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connotation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ake the path of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higher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gration with intelligence.

Key Words: Integration; Intellectualization; Higher Quality;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责任编辑:齐 双)